

# 中外合作办学 历史·政策·现状

The History, Polici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程良龙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www.bjtup.com.cn>

# 中外合作办学 历史·政策·现状

程良龙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全面论述了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原因、特点及其历史意义，系统地分析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在分析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的基础上，推论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的前沿动态及发展趋势，并将辽宁省普通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与专业建设相结合，数论共析，提出了辽宁省开展中外合作的发展对策。

本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视角，以史为据、史论结合，将中外合作办学历史、政策、现状衔接为一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评析现状，找寻规律，探求趋势。书中提出的观点独特、新颖，对丰富我国刚刚兴起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理论、促进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具有借鉴与指导的作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合作办学历史·政策·现状 / 程良龙著. —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9

ISBN 978-7-5121-2079-2

I. ① 中… II. ① 程… III. ① 国际合作-联合办学-研究-中国  
IV. ① G5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2441 号

**责任编辑：**孙晓萌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 刷 者：**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35 **印张：**12.25 **字数：**25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21-2079-2/G · 227

**定 价：**48.00 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对您的意见和批评，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投诉电话：010-51686043，51686008；传真：010-62225406；E-mail：press@bjtu.edu.cn。

# 前　　言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其他教育领域，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的形成时间较短，理论体系尚需不断完善；政策性强、受时空限制因素较多，办学模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评价体系等也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伴随着社会变革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实现了从书院到学堂再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演变。我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演变，不仅受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统治者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西方外来因素的强烈冲击，尤其在近代，洋务运动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从闭关自守到打开国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由被动的仿效移植到主动的面向世界。教会大学引进了西方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新的教育模式撞击着腐朽、衰亡的封建教育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破”和“立”的双重作用，它不仅打破了旧的教育模式，而且缩短了教育向近现代化转变的时间，并推动了早期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20世纪初创立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创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先河，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富有成效的碰撞、交融与互补，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开放型的进程，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经历了教会大学被接收、合并、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三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出螺旋式发展态势。进入21世纪，我国颁布了一系列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和法律、法规，在维护教育主权完整、保护办学权益最大化、强化本土实施、保障办学质量、兼顾公益性和营利性等方面，促进和规范了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教育改革的持续深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中外合作办学规模逐步扩大，办学层次逐渐提高，办学形式呈现出多样化。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再次得以迅速发展。

本书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开展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历史（第1章、第2章）、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第3章、第4章）、中外合作办学现状（第5章、第6章），三者既相对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对丰富我国刚刚兴起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理论，以及促进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开展具有一

定借鉴、指导作用。

本书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史为据、史论结合。坚持实事求是，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评析现状，找寻规律，探求趋势。

限于著者的理论水平与认知能力，书中必有疏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程良龙

2014年9月

## 作者简介

程良龙（1969—），男，安徽合肥人，大连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教学管理与研究。

近年来，主持省级教育科学与教学改革课题6项，发表论文近20篇，获省级教育教学奖励5项，其中作为第一获奖者连续三届荣获辽宁省教学成果奖。曾赴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多所院校进行访问与学术交流。

兼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通讯评议专家、辽宁省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常务理事。

# 目 录

<b>第1章 中西文化交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b>	1
1.1 中西文化碰撞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的嬗变	1
1.1.1 书院——中西文化交融的桥梁	2
1.1.2 由书院改学堂——“西学东渐”的产物	6
1.1.3 由学堂到大学——中西文化交融的必然	9
1.2 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13
1.2.1 中西文化交融催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芽	14
1.2.2 中西文化交融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创建	17
1.2.3 “以苏为师”促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	22
1.2.4 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变化导致对外交流基本停滞	25
1.3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	27
1.3.1 改革开放要求高等教育面向世界	27
1.3.2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	30
1.3.3 改革开放后的历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与高等教育对外合作交流	32
<b>第2章 我国早期的中外合作办学组织与形式</b>	35
2.1 教会大学——我国早期的外方独立办学机构	35
2.1.1 教会大学产生的背景	36
2.1.2 教会大学的发展	38
2.1.3 教会大学的办学特点	42
2.1.4 教会大学的办学影响	50
2.2 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德华大学	52
2.2.1 德华大学的创办	52
2.2.2 德华大学的办学	54
2.2.3 德华大学对当下社会的影响	57
2.2.4 德华大学的终结	58
2.2.5 德华大学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	58

<b>第3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外合作办学</b>	61
3.1 新中国成立后的3年（1949—1952年）	61
3.1.1 教会大学被接收（1949—1951年）	61
3.1.2 教会大学被合并（1951—1952年）	64
3.2 以苏为师，社会主义“中外合作办学”的尝试（1952—1956年）	66
3.2.1 院系调整	67
3.2.2 教学改革	68
3.3 “教育革命”与高等教育的调整、整顿（1957—1965年）	69
3.3.1 “教育革命”使社会主义“中外合作办学”受到了严重冲击	69
3.3.2 高等教育的调整、整顿——社会主义“中外合作办学”得以部分回归	71
3.4 “文化大革命”（1966—1977年）期间中外合作办学停滞	73
3.5 改革开放后的中外合作办学（1978年至今）	74
3.5.1 教育对外交流的复苏	74
3.5.2 中外合作办学的恢复	75
3.5.3 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	77
3.5.4 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	79
3.5.5 中外合作办学的调整	80
3.5.6 中外合作办学的螺旋式发展	83
<b>第4章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分析</b>	93
4.1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行政策	93
4.2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行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96
4.2.1 维护教育主权完整	97
4.2.2 保护办学权益最大化	99
4.2.3 强化本土实施，保障办学质量	101
4.2.4 公益性和营利性兼顾，允许合理回报	102
4.3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行政策的主要问题	104
4.3.1 办学政策意向与办学政策环境不配套	104
4.3.2 办学政策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完善	105
4.3.3 办学审批与办学监管职能错位	105
4.3.4 办学利益冲突严重	107
4.3.5 办学监管机制缺乏有效性	108

4.4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行政策的调整 .....	109
4.4.1 教育规划纲要指明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向 .....	109
4.4.2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修正与调整 .....	111
4.5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行政策修正的研究 .....	114
4.5.1 关于“四个三分之一”的规定 .....	114
4.5.2 “四个三分之一”的实效性 .....	115
4.5.3 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 .....	116
4.5.4 “四个三分之一”的修正建议 .....	118
<b>第5章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现状与发展趋势 .....</b>	<b>120</b>
5.1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 .....	120
5.2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 .....	121
5.2.1 中外合作办学的数量与地域分布 .....	121
5.2.2 国外合作国家（地区）分布 .....	123
5.2.3 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 .....	124
5.2.4 中外合作办学的院校 .....	126
5.2.5 专业与分布 .....	128
5.2.6 合作模式 .....	128
5.3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评析 .....	129
5.3.1 中外合作办学的积极作用 .....	129
5.3.2 中外合作办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	131
5.4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趋势 .....	134
5.4.1 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交流面临的形势 .....	134
5.4.2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任务 .....	135
5.4.3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趋势 .....	135
<b>第6章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 .....</b>	<b>141</b>
6.1 辽宁省普通本科院校专业建设的现状 .....	141
6.1.1 普通本科院校的数量与分布 .....	141
6.1.2 普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 .....	143
6.1.3 特色专业的建设 .....	147
6.2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历程 .....	151
6.2.1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萌芽 .....	151

6.2.2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兴起	153
6.2.3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	154
6.2.4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在规范中再发展	157
6.3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	160
6.3.1	中外合作办学的概况	160
6.3.2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分析	161
6.3.3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分析	163
6.4	本科专业设置与中外合作办学	167
6.4.1	中外合作办学开设专业与本科专业设置	168
6.4.2	中外合作办学开设专业与特色专业	168
6.5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成效	170
6.5.1	中外合作办学成为辽宁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外在动力	170
6.5.2	中外合作办学促进辽宁省高等院校走国际化办学之路	172
6.5.3	中外合作办学助推辽宁省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	173
6.5.4	中外合作办学为辽宁省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	174
6.6	辽宁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对策	175
6.6.1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需进一步加强调控	175
6.6.2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为区域服务的支撑力需进一步增强	176
6.6.3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保障与评价体系有待建立与完善	177
6.6.4	辽宁省中外合作办学的效益有待改善	178
	参考文献	180

## 第1章

# 中西文化交流促进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

伴随着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1 000多年变革，我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实现了由书院到学堂再到普通高等学校的演变。我国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在演变过程中，不仅受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统治者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西方外来因素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在近代，洋务运动掀起了西学东渐的浪潮。从闭关自守到打开国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转变，并由被动的仿效移植到主动的面向世界，逐步实现为统治者服务、为阶级服务、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纵观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无不刻有西方教育的烙印。

### 1.1 中西文化碰撞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 组织形式的嬗变

书院创建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推广于元代，辉煌于明代，并被移植到国外，普及与变流于清代，直至清末“戊戌维新”后，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新式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统一办学宗旨，多数是学习日本、仿照西方，积极引入资本主义新文化。辛亥革命后，学堂改为学校，民国政府颁布了《大学令》，中国高等教育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作为外来文化载体的现代大学逐渐开始生根发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等

教育“以苏为师”；改革开放后，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指引下，再次打开了自闭窗口；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后，高等教育全面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 1.1.1 书院——中西文化交融的桥梁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逐步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作为藏书、教学与研究三项功能相结合的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机构，前后有千余年历史，对中国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桥梁。

#### 1. 书院的发展历史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据《旧唐书·职官志》载：“藏书、校书之事。”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进而发展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如唐玄宗时期最早设立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尚不具备授徒讲学的性质。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最早应为张九宗书院。唐代有部分私人书院，明确有讲学活动，如皇寮书院：“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袁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等。私人书院作为教育组织的萌芽，由读书逐步发展为讲学。因此，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书院。

宋代是书院得到全面发展并形成制度的时期。两宋时代，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印刷技术进步带来了丰富的藏书，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事业进入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北宋时期以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集中体现了宋初书院替代官学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强化的教育教学功能。南宋时期书院开始发达与兴盛，并逐步走向成熟，其突出标志为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书院制度的形成与确立。书院制度采纳了佛教尤其是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将儒、道、佛三教文化融合，其派出传播文化的功能。尤其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了为学方向，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学之之序”。《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蒙元亡宋以后，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部分汉族儒家学者拒绝到元代的朝廷做官、任职和去所设的官学中任教，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到官方所设立的书院就读，他们自立书院，招生徒讲学。元代统治者吸取辽、金两朝的统治经

验，认识到稳定统治须有赖儒学，兴教化以行文治，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对各地书院的建立和恢复加以鼓励和提倡。为防止战争对书院的破坏，元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忽必烈下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对书院等文化教育设施加以保护。书院在元代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护下得以迅速发展，书院依例复旧，由是，诸学者弦诵不绝。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组织管理、师资任用、经费供给等都加以控制，最终使书院官学化。元代书院由原来的“尊孔崇儒”发展为“尊崇理学”，以传播程朱理学为宗旨，促进理学逐渐北移，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官学化既是元代书院的发展趋势，又是中国书院性质发生重大转变的因素之一。

明代书院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为从思想上加强统治，明代初期，朝廷实行了一套重视官学、压制民间学术的文教政策。为此，作为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书院长期得不到发展。明朝后期，随着王道衰弱，特别是官方选士制度——科举制的日趋腐败，官学出现了危机。这时，部分士大夫开始在地方纷纷兴办书院以拯救文化，使书院再度发展并具有平民化特色和社团化的倾向。明代书院多兴于讲学之需，在“藏书”和“讲学”这两个重要职能中，明显向后者倾斜。作为明代书院振兴的积极倡导者王守仁，他和湛若水等人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掀起了书院讲会制度的高潮。讲会式书院在明代众多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注重讲学传道，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联系和交流。随着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书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国外。明正统四年（1439年），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书院制度输出到朝鲜，开始走向世界。后来，书院被移植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书院为传播中华文明，进而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书院最大特点是普及和流变。清初，满汉民族矛盾加深，满清朝廷害怕书院讲学会宣传“严华夷之辨”的爱国主义精神，于是，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随着“康乾盛世”来临以及社会逐渐稳定和经济日益发展，民间的私立书院日益增多，部分封疆大吏也开始设置书院。此外，由于清朝政权日益巩固、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满汉民族矛盾逐步缓和等因素，清代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不少书院，尤其在乾隆时期，书院在数量、规模和分布上更是盛况空前，由此对满族文化的影响也日益加深，促进了满汉民族的融合。

书院教育内容丰富，办学类型可归纳为以理学为主的书院、以经史辞章为主的书院、以考课为主的书院、新式书院四种。其中，以考课为主的书院在清代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这类书院不是讲学，而是考课，以学习八股为主，学习目

的是科举考试，这也反映出科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进一步加深。新式书院注重学习西洋近代科学，一方面，教会书院的出现，尤其是日本人将招收日本学生的书院办到上海等地，揭示着书院在殖民化下可悲的流变；另一方面，由于与“新学”“西学”的结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式书院显示了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信心与能力。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海成立了格致书院，由徐寿和英国人博兰雅（John Fryer）捐资创办，聘请西方人教授格致之学（即自然科学），书院还设有博物院，陈列工业模型、交通模型、天文模型、地理模型等。直到晚清新政之时，随着新学制的实施（1904年）和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书院才从教育的核心位置退出，改制成学堂，逐步被现代西式教育体系所取代，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连接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并在改制后获得了新生。

书院在其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值得借鉴：

第一，书院组织机构较为精干，主持书院的多数是学术造诣深厚的名学宿儒。

第二，书院既是教学组织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

第三，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交流和论辩，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第四，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教学不受区域和学派限制。

第五，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个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

第六，书院内师生关系较为融洽，师生感情深厚。

第七，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经费主要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

纵观书院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书院制度始终是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常常因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得以发展；而书院的发展，尤其是当书院充分显示其特点的时候，又往往同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为统治者所不容。在书院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时作为官学的补充，有时又成为官学的对立物，最终统治者竭力使之官学化。这就是书院制度时兴时衰的真正原因。

## 2. 书院制度的移植

书院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一种独特的“书院文化”，为中国教育、出版、藏书、学术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培植、思维习惯、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书院也走向世界，“书院文

化”被移植到国外，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书院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与当地文化的结合，进而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

中国书院自明代开始移植国外的历程。书院最初在朝鲜半岛推广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朝鲜的文化、学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书院又由外国传教士移植到西洋的意大利、由华侨移植到南洋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因此，中国书院在清初就形成了东洋—西洋—南洋移植的态势。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和中国本土书院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能保持不变。但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书院又有着区别。其区别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华侨聚居区，由国外华侨创建的书院，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中华根本，因此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另一类是在东亚地区，因处中国文化圈内，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本土看齐，但又具有其自身特点，如韩国书院注重祭祀、日本书院强调刻书出版等；还有一类是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圣家书院（文华书院）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和形式与本土书院相差甚大。值得关注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渐强大，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以小胜大，战胜中国，这激发了中国学生留学东瀛、学习强国富民之术的热情，留日学生数量日益增加。移植到日本的书院由此成为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较有代表性的有东京亦乐书院、东京同文书院等。同时，日本人把书院办到中国本土，这是书院的回流，较有代表性的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

唐宋以来，中国书院不仅为中国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学东渐之时，来华的外国人将其创立的文化教育机构，无论是“College、Academy、School、University”等都叫作“书院”；而走向世界的中国学者，也将他们所见到的近代学校、实验室、科学馆、博物馆等都称作“书院”介绍给国人。中西人士对“书院”的这种认同，体现出书院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功效。

传教士与书院的关系有一个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对中国书院及其文化功效认识较少，更不了解中国土人将其视为与西方文明相对抗的中华文明象征之一的心态，因而出现了改书院为天主堂这种在中国土人看来属于“冒犯”的行为。正是这种碰撞，使得来华的教士们逐渐认识、了解书院，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由外国传教士们创办的书院——“教会书院”。当传教士在教会书院用中文向中国教徒和学生传教、授课时，他们就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因此教会书院也就成了名副其实地融汇中西文化的实体。代表西方文明主要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与反映东方文明主体精神的儒家思想，在这里相聚、相

撞、相融，使得它成为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重要园地，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教会书院将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列入课程，编写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教育教材，建立了科学实验室和附属工厂等。教会书院成为近代中国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也是在中国最早开展科学教育的单位之一，为近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了经验。从本质上讲，教会书院是移植到中国的西式学校，西式管理（如分班教学）、西式课程、西式教学方法（如培养思维能力）以及由此而构成的西方学校办学理念，对它原本模仿的对象——传统书院形成了一种压力，使其变通、改革，反过来再仿效模仿者，最后走上了从古代向近代学校的过渡之路。

另一类教会书院是在中国旧式书院趋于没落、面临改制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教会书院与中国旧式书院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形态。同时，教会以书院为平台向中国的传统文明靠拢，争取官绅和士大夫阶层的同情与支持。教会书院的发展正值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时期，其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表明：为使书院能立足中国，进而通过培养人才达到影响中国社会之目的，传教士在社会转折时期不断地把握时机，对自身进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从在中国外围办学，扩大到在中国本土办学，然后又率先重组成为教会大学，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种种迹象表明其确实试图与时俱进。尽管这样做有着明显的政治动机、经济动机和宗教动机，但它拓展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范围，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形成了挑战，这一点应予以肯定。

### 1.1.2 由书院改学堂——“西学东渐”的产物

清末新政时期，清朝政府下令改天下书院为学堂，并制定了统一的学堂学制章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不仅是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还包括了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以及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和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变化。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学习仿效、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教育，逐步改造中国封建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历史证明近代教育改革实践是人们基于对西方学制的认识，仿照西方教育进行的各种尝试。清末的教育近代化，一直是在沿着两条路径进行探索：传统教育机构内部改革以及外部新建新式教育机构，这使得学堂一出现就处于和书院互补并存的局面。

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割土赔款、开埠传教，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扩张和国家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开始认识和察觉到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实际行动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兴起近代史上第一次学习西方、改革旧制的思潮。他们要求改革社会，抵御外辱；提倡学习“西学”，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他们治学的最大特点是讲求实事、实功、实效，注重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急迫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学习西方、改革旧教育思潮尚未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是改变了少部分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的思想认识，未能引起统治者的真正觉醒。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西方学习、仿效才算真正开始，对原有教育制度的改革才获得了实质性进展，其显著标志是“洋务运动”。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古老中国所开展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自强求富运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起点和标志。“洋务运动”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教育变革作为变法的主要任务之一，被视为医治“千数百岁之痼疾”的良方，也被视为救国之急用。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阐述到：“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成大成，在变官制。”蔡元培曾提到：“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策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教育的社会功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放大，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教育救国思潮。

19世纪80年代末，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各种方案，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和创设西学书院三方面。郑观应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书院为学堂设想的思想家，他建议根据书院的层次，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1896年8月，孙家鼐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明确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教育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建立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可分为四类：外国语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军事学堂和实业学堂，并确立了迥然不同于传统教育的技艺人才培养目标。外国语学堂培养的是懂得西语、熟悉国际公法和各国政情的人才，如京师同文

馆、上海广方言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军事技术学堂培养的是能够掌握先进技术、制作先进武器的人才，如福建船政学堂等；军事学堂培养掌握近代战争战略、战术的各种指挥型人才，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实业学堂则培养工程制造、矿冶、交通、电信、轮机、机械等方面的人才，如福州电气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南京矿路学堂等。这些学堂最著名的代表是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福建船政学堂等。

“洋务运动”后期，随着“师夷长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进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即开始从“西技”方面扩大到“西学”“西政”方面。如何把这股潮流纳入“洋务”范畴，化“西学”为“中学”，使封建制度免遭根本的冲击？其间，书院教育面对西方教育文化的源源东渐，在东西文化相互的碰撞过程中，起到暂时承接和消化的缓冲作用。

“戊戌维新”进一步加快了西学东渐的进程，具体体现为书院改学堂。戊戌年（1898年）正月初八，康有为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为“戊戌维新”的施政纲领），请求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走明治维新之路。“学校局，掌于京师。各直省即书院、佛寺为学堂，分格致、教术、政治、医律、农矿、制造、掌故、各国语言文字诸科，别以大小，公私并立，师范女学而广励之，其有新书、新艺、新器者，奖劝焉”。同年5月22日，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宣布：“著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复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扩大已版译著的传播面，而且有选择性地推荐了部分西方名著，从而在当时形成了中国人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梁启超还编纂有《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其中列举的西学书目达300种，成为时人阅读西书的指南。

“戊戌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之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止。但“戊戌维新”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对平等、自由、民主精神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戊戌维新”之前，人们致力于以学习西方为目的的教育改革，全国教育改革路径基本上是新设学堂、新设书院、改革书院。到清末，教育改革以教育救国